

從中國史的視角看華南研究

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 趙世瑜

以我淺陋的知識，現代意義上的中國區域研究，包括華南研究，是從20世紀20年代以後開始的，其實在這裡，起初歷史學家的貢獻似乎不如社會學家、民族學家、民俗學家和人類學家，當然也不是完全沒有，而後者的研究往往也帶有歷史學的意義。但是今天的華南研究，已經是多學科的一種缺一不可的合作，這在我們的《華南研究通訊》和多種著作論文中明顯體現出來。當然在華南研究當中，我們看到的更密切的合作發生在歷史學與人類學之間，但我想這很不夠，因為歷史學與人類學還不能解決一切問題，而已有的情況讓我們知道，在區域研究中，法學、政治學、經濟學、民俗學（民間文學）等等也往往扮演重要角色。

在《華南研究通訊》的創刊號上，濱下武志教授在賀信中提出了華南的空間範圍問題，這個我沒有發言權，但是我把對廣東、福建、台灣、海南地區，包括與這些地區接壤的江西、廣西、浙江的邊緣地區，視為這個空間範圍之內。對這個地區的社會、文化、歷史的研究，即是華南研究。我的看法是，華南研究既是區域研究，它就應該是一個整體的、綜合的研究，因此對任何一個學科出身的學者來說，任何研究專題（topic）都應是跨學科的，這就是區域研究對中國研究或中國史研究的方法論意義。同樣因此，我也殷切希望看到華南研究中的思想史和新政治史，看到一些其它的領域。當然，在方法的層面，華南研究者為歷史學提供了文獻工作與田野工作相結合的範例，這一點我在《民俗研究》上已專門介紹了，這事關中國歷史傳統的特點。

當然這又不僅是個方法論問題。一個地區對一個國家究竟占有什麼位置？具有什麼意義？這是區域研究背後隱藏的大問題。華南研究的學者們也在回答這樣的問題，人類學的族群理論也指向這樣的問題，施堅雅（W. Skinner）的區系理論也涉及區域之間、以及區域與國家之間的關係。所以任何一個區域研究都不能迴避局部與整體的關係。怎樣切入到這樣的問題中去呢？目前探討國家與社會（民

間社會、地方社會）的關係也是一個切入點。當然，回答這樣的問題，也有賴於對其它區域研究的程度，這樣才能有一個比較的視野。在這個意義上，華南研究是個“偉大的先行者”，它的一些嘗試為其它區域研究的展開提供了榜樣。

最重要的是華南研究的範式意義。從歷史學的角度來說，它體現的是真正意義上的、也就是範式意義上的社會史。中國史目前還是政治史，表面上有些冠之以“社會史”或“文化史”之名的研究實際上還是範式意義上的政治史。絕大多數研究還是精英的歷史，雖開始有“眼光向下的革命”，但還沒有意識到“自下而上看歷史”的意義。我們看到，華南研究的一些代表性作品，大都是關於基層社會的，但它們並沒有放棄制度、權力、意識形態等等國家的表証，而是通過觀察基層社會以便更了解後者。

我希望，華南研究不僅是區域研究，也是中國研究，至少它是中國研究的一個實驗場。對於中國史來說，凡是它所關注的問題，華南研究都應該關注，或者反過來說，華南研究應該提出中國史所應關注的問題。從後者看，中國史要解決歷史發展階段劃分的問題，或者說是社會變遷、社會結構變動的問題，華南研究也要解決，這是共性；從前者看，華南研究為這些問題提出的答案可能是獨特的，但卻是有益的，使人了解中國社會變動的多樣性，這是個性。華南研究今後的走向就是進行二萬五千里的長征，從邊緣的位置走向中心，從自說自話走向主流話語。當然到這時，按庫恩（T. Kuhn）的說法，它也就開始了被新範式取代的過程；或按波普爾（Karl Popper）的說法，它也開始被“証偽”。此是久遠以後的後話，暫且不提。

1999年4月27日

（編者按：本文為作者應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華南研究中心邀請，於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七日講座中的發言提綱，現徵得講者同意，於本刊發表。）